

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的“祖籍记忆”初探

俞云平,杨晋涛

(厦门大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调查表明,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的国民认同和族群认同均表现出相当的强度,我们倾向于把这种“双强”的特征看作是走向多元文化主义的马来西亚华裔集体自我意识的结构特征。而“祖籍记忆”正是华裔构建其族群认同的意识和文化基础。一方面,华裔可能通过和祖籍国建立更多的联系来维持和加强祖籍记忆,以达到强化族群意识的目的;另一方面,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背景下,为立足当地生存和发展,将祖籍国“对象化”也成为其策略。

关键词:马来西亚;华裔;祖籍记忆

中图分类号:D634.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06)03-005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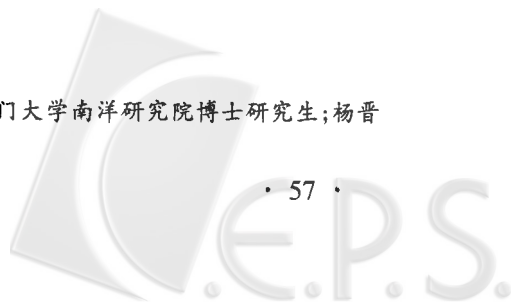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华人社会发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变化,华侨社会逐步过渡到华人社会,新一代华人在政治认同、身份意识、文化认同等方面都与老一辈华侨有很大的不同,马来西亚也不例外。2004年,我们在部分东南亚国家来福建的青年中开展了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发放问卷约150份,收回97份,其中涉及马来西亚华裔的问卷18份。另外,我们委托来自马来西亚董教总的王先生在马来西亚做了问卷39份,我们还在一些熟悉东南亚情况的人士以及厦门侨委、侨办的知情者等当中以对话、座谈等方式开展深度访谈。以此为出发点,我们结合有关文献资料,对部分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的“祖籍记忆”进行初浅的探讨。

一、问卷所涉及的华裔的基本情况

我们收集到的马来西亚华裔的问卷共有57份,男女比例为43.9:56.1,女性的比例较高。年龄从18.9岁到53岁都有,但绝大部分(76%)是1975年以后出生的青年,未婚者占82.5%。他们当中没有第一代华人移民,第二代华裔也仅占7.0%,主要是第三四代华裔,加上自己都不知道是第

收稿日期:2006-04-20

作者简介:俞云平(1964-),女,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副教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杨晋涛(1967-),男,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讲师,博士。



几代的华裔,比例高达91.2%。从这几项指标看,这57人中的大部分是马来西亚华裔的新生代,主要是世纪之交的华裔青年。

在我们调查的这些马来西亚华裔中,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员占82.5%。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属于中等水平的,占96.5%。因为我们的问卷有一部分是在在校学生中做的,有一部分是在来中国进修的教师中做的,所以学生身份的人员占了26.3%,教师的比例也有21.1%,除去这两部分,最主要的职业是公司职员(24.6%),以及包括医生在内的专业技术人员(14.1%)。从这些基本情况可以看出,本问卷所涉及的马来西亚华裔大多是家庭经济状况中等、个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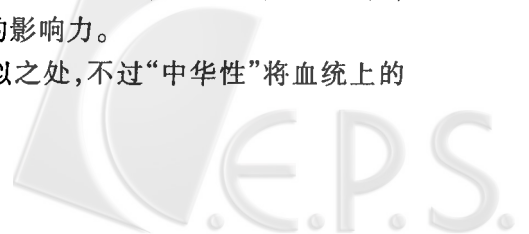
语言是文化遗产的重要工具,也是形成族群认同的重要元素。我们问卷所涉及的华裔中,接受马来语和汉语并重的双语教育的人数不少,占36.8%,另有40.3%的人以马来语为主、汉语是必修课或选修课,14%的人受纯粹的华文教育。马来西亚是中国境外华文教育体系最完整的地区。据统计,1995年马来西亚有1287间华文小学,学生592184人,教师26377人;有60间华文独立中学,学生58948人,教师2596人。[1](P32)另有拉曼学院、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等华文大专院校。在小学教育阶段,华裔子弟大部分就读于华小,但中学能上华文独中的人数非常有限,大部分还是上政府办的国民中学,华语只能作为选修课。因此,这里所说的双语教育一般指读华文小学、马来语中学这样的模式。

学校教学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是关联的,但也是有差别的。我们设计了“对日常生活具有影响的语言有哪些”的复选题,马来语、英语、汉语普通话都有很高的中选率,分别为78.9%、77.2%、80.7%,但在评估这几种语言的重要性的单选题中,认为汉语普通话最重要的占35.1%,认为英语最重要的占17.5%,认为马来语最重要的仅占3.5%。考虑到我们的问卷对象与中国的联系较为密切,自然对汉语普通话的重要性评价较高,但根据其他途径的调查来看,英语在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中非常流行,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祖籍记忆的定义

我们把“祖籍记忆”作如下的定义:东南亚华人由于自己祖辈来源的同源而产生的心理纽带。由于这种纽带,他们承认自己和中华有一种象征性的联系,这种承认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行动。它具体表现为语言的共同性、文化习俗的习用和价值观的养成,与祖籍国建立某种联系的意愿等等,并在与当地主要族群的互动中构成凝聚群体的主要心理和政治资源。因为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东南亚华裔新生代一方面已经把居住国当作自己的“祖国”,但是同时,他们也表现出对自己华裔身份的程度不同的认知和认同,对于和祖籍国建立起比较紧密的关系也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我们统一采用“祖籍记忆”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试图厘清“祖籍国”作为一种文化表征在对于他们的意义,总体的印象是:第一,自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在东南亚各国从殖民地走向独立以来,东南亚华人与自己祖籍国联系的紧密性逐渐减弱;第二,但是同时不能否认,在上述情况下,即使是在新一代当地华人中,借助家庭和社区的文化仪式,一方面凸现自己与当地人的差别,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对祖籍国的记忆和想像,这种记忆和想像实际上构成了华人建构自己群体的资源;第三,由于国际政治因素,也由于中国本身放弃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以及坚持“处理国际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等政策,在一般情况下,华人社会和个体不能期待中国对自己的族群政治诉求给予直接的支持,但是祖籍国的成就和声望的确能影响各国华人的自豪感和地位,从而对华人承认自己群体的特殊价值和加强内部团结具有间接的影响力。

“祖籍记忆”这个概念和韩方明的海外华人的“中华性”有类似之处,不过“中华性”将血统上的



一致或同源视为核心特征,[2](P31)而“祖籍记忆”更强调文化的心理表象和认同感,而将对血统的认知也视为文化心理的一部分。从理论上来说,“祖籍记忆”是格尔兹所谓原生性纽带在华人族群认同建构中的具体表现。[3](P291-354)

三、对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祖籍记忆的几点考察

(一)对中华文化的认知程度

考察华裔新生代具备的有关中华文化的认知程度,是帮助我们分析他们祖籍记忆的重要参考指标。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不但在经济领域取得长足的发展,在华人文化活动方面也很丰富。早在1971年,马来西亚政府提出国家文化概念,就是要以马来西亚原住民文化为核心来塑造国家文化,华人文化被边缘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警察及相关部门积极地干涉华人各种各样的文化表演,反而激起了华人社会的强烈反弹。华人的文化危机感在80年代出现高潮。[4](P130)1983年15个华团提出《国家文化备忘录》,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推动各州华团领导机构轮流举办华人文化节。因此1984年以来,“全国华人文化节”年年举办,以文艺表演、讲座研讨等形式向全社会展示华族传统文化,各华人社团机构也时常举行舞狮、武术、贴春联、挂灯笼等民俗活动。这些都对华裔新生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在东南亚各国中,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对中华文化的认知程度最高,他们基本上都见过舞龙舞狮,知道划龙舟、祭祖先等带有祖籍地传统文化色彩的活动,在我们列出的具有中西文化象征的20个名词中,有52.6%的人能完全正确地选出关公、孔子、孙悟空、筷子、针灸、古筝、八卦、京剧、琵琶、武术、指南针等是属于或源于中华文化的,选错1~2题的占33.3%,仅有14%的人选错3题以上。近60%的人还能准确地知道素有“中华民族摇篮”之称的母亲河是黄河和长江。

表1 选出中华文化项目的正误率(%)

答案	人数的百分比(%)
全部正确	52.6
选错一个	15.8
选错两个	17.5
选错三个	0.0
选错三个以上	14.0

对于中华文化所包涵的各方面内容,如传统历史文化、民间民俗风情、民族器乐、书法国画、民族服饰、饮食茶艺、武术象棋等等,90%的人表示有兴趣而想了解,其中约有1/3的人选择了“很有兴趣”,不了解也没兴趣的人仅有5~10%。比较他们对以上这些中华文化内容的感兴趣程度,我们发现,大部分人最想了解的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对此很有兴趣的占35.1%,是所有内容中比例最高的。在对待中西医的态度上,89.5%的人认为中西医各有特点,可以互补。这些现象一方面可以用陈志明提出的“文化关联”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在历史和文化上与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有文化上的关联,这对受中文教育的华人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有能力阅读华文,就意味着他们接触到或更有机会直接接触到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中国文化的关联性与华裔族群的关系在一些方面可

以跟讲英语的人对英美文学的特殊兴趣相比”；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对自己民族之根的追溯、思考,反映出祖籍记忆对他们认知倾向的影响。[5](P27-35)

(二) 华人价值观

价值观是华裔新生代的“祖籍记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由于共同的祖籍国背景,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华人生活圈的薪传和教化,一些中华传统价值观成为他们人格和自我的一部分。当然,融入主流社会和现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他们也在进行价值观的扬弃。我们尝试通过表2中所列的价值议题来分析华裔新生代对中华价值观采纳和扬弃的情况。

表2显示,传统价值观中的“孝道”得到华裔新生代最大的认同。对“义气”、“礼仪”、“关系”的说法也给予相当程度的肯定,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也得到充分的肯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马来西亚逐步走向现代化、华人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华族文化传统并没有被抛弃,华人价值观仍然在华裔新一代中延续着。

表2 被调查者对与中华传统价值观相关议题的认可程度

态度 俗语	赞同 (%)	一般 (%)	不赞同 (%)	不知道 (%)	未填 (%)
1. 孝敬父母是每个人的本分	96.5	1.8	0	0	1.8
2. 朋友相交要以义气为重	86	12.3	0	0	1.8
3. 家丑不可外扬	49.1	29.8	17.6	1.8	1.8
4. 亲不亲 故乡人	54.4	35.1	1.8	3.5	5.3
5. 有关系 好办事	63.2	29.8	5.3	0	1.8
6. 华人勤劳节俭吃苦耐劳	75.4	17.5	5.3	0	1.8
7. 礼多人不怪	80.7	12.3	5.3	0	1.8
8.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有其独特的价值	93.0	5.3	0	0	1.8
9. 中国如要现代化就必须摒弃传统文化	10.6	19.3	68.5	0	1.8

四、祖籍记忆与族群认同和国民认同

“族群认同”是东南亚华裔对于自己特殊身份的认知,由于在祖辈来源、文化传承等和当地人不同,对这些内容的认知在华裔和当地人之间构建出“区别感”,所在国和族群自身都利用这种区别感来进行群体分类,并在这个分类的基础上发生族群与族群之间的互动。需要强调的是,“族群认同”固然是有其文化历史渊源的,但是我们主要从当代具体的族际互动关系来看待它。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当地性”,正如庄国土有效地区分了“中华民族”和“华人族群”,也正如近年开始流行使用的“华族”这个概念所暗示的内容,[6][7]华人华裔作为一个族群,是当地的一种群体政治现实,在不否认这个族群有其文化历史渊源的前提下,我们强调“华人族群”是当地政治生态的产物,因此,这里的“族群认同”是华人立足于当地民族关系和现实身份感受而构建的自我定位。另一方面是“当代性”,二战以前以“叶落归根”为自己人生指向的华侨,向以“落地生根”为人生指向的华人或华族的转化,是当代东南亚华人历史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当代国际政治(如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和华人所在国国内民族政治双重影响的产物。



“国民认同”是华裔对自己国籍和公民身份的认知,按照格尔兹的理论,这个方面属于“公民性认同”,其强度直接影响到华裔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主动参与程度。它和祖籍记忆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正如格尔兹所说的那样“原生性感情和国民感情并不处于直接的、相互对立的隐喻性进化关系中……它们的发展史并不简单地在于一个的扩张以另一个的牺牲为代价”。[8](P308)

“族群认同”是“国民认同”和实现国民参与的具体方式和表现,也就是说,华裔群体以自己的“族群认同”形成群体分类,并以这样的群体为基础参与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

“祖籍国记忆”和“族群认同”相互表里,一方面,华裔族群形成的同时,也就在自己的成员中保留了对祖籍国的记忆和想像,另一方面,这种记忆和想像也会促成、维持甚至强化成员的族群意识。简单地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把“祖籍记忆”看成华裔构建其族群认同的意识和文化基础。

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马来西亚的华裔社会已经完全过渡到华人社会,华人的国民认同问题已经解决,土生土长的华裔新生代已经完全当地化,与前辈相比,他们对祖籍国的感情已经淡化。在我们的调查中,有 64.9% 的人认为父辈祖辈对祖籍国的感情要比他们强。在那些尚未就业的学生中,有 70% 以上的人希望将来的职业是商人或专业技术人员。而在回答希望到什么地方发展事业时,2/3 的人只选了马来西亚,1/3 的人选择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多个地方。对他们来说,在马来西亚扎根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马来西亚是他们唯一的“家”,离开这个“家”,他们的感情将无所寄托,而他们对这个“家”的关怀,也常常超越族群问题,跨到更深更远的全球视角,如环保、人权、卫生等等。[4](P237)

当然,虽然当地化了,但是华人在当地依然程度不同地以华裔族群的社会身份出现。他们仍然保留着华人的民族特性,以及对族源的历史记忆,他们传承祖籍地的宗教传统、庆典仪式,运用祖籍地传统的地缘血缘关系建立同乡会、宗亲会等华人社团。在这里,与祖籍记忆相联系的传统提供了一个华人文化认同与华人意识的表达,[9](P16)使华人形成为与当地民族保持种族文化上的相对独立性的少数民族群。华人对与当地人的通婚的态度和信仰情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作为观察这种相对独立性及其变化的窗口。

表 3 1991 年东、西马华人宗教信仰类别统计

宗教类别	1991 年度信徒百分比
伊斯兰教	0.40
基督教	7.80
兴都教	0.20
佛教	68.30
儒/道/其他华人传统信仰	20.20
部落/民俗宗教	0.10
其他	0.30
无宗教信仰	2.70
不知道	0.30

资料来源:苏庆华:《新马华人研究——苏庆华论文选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创价学会 2004 年版。

在马来西亚,马华两族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很大,表3是关于1991年东、西马华人宗教信仰的统计,我们的调查情况基本与之吻合(见表4),华人信仰伊斯兰教的很少,因宗教习俗等因素的阻碍,马华两族间的通婚情况并不多见。在我们的访问对象中,78.9%的家族中没有异族通婚的情况,19.3%的家族仅有个别的异族通婚的情况,因为无法对这19.3%的家族进行深入的追踪,我们不能确定这个“异族”中有多少是马来族,但从其他访谈来看,华人与马来族通婚的比例很少,大多是与泰族等民族通婚。当然,华裔新生代对待异族通婚的心态已经比他们的前辈开放得多(见表5),不介意自己的配偶是否华族的人已经超过半数。有意思的是,大多数男性表示不介意,而女性大多数还是介意的,可见华人的传统习惯基本上没有改变。

表4 信仰情况(%)

伊斯兰教	0.0
基督教	8.9
佛教	40.4
儒/道/其他华人特有的民俗信仰	24.6
无宗教信仰	21.1
居住国当地的部落/民间宗教	1.8
其他	1.8

表5 你的家人和你自己是否介意你的配偶是不是华人?

态度	介意	不介意	未填
家人	31人	21人	5人
自己	23人	28人	6人

表6 自我身份的主观态度(单选题)?

几种说法	选择人数	比例
1、我是居住国国民,和土著居民没什么不一样,有没有华人身份都无所谓	2人	3.5%
2、我首先是居住国的公民,但我很清楚我的华裔身份	34人	59.6%
3、我很认同居住国国民的身份,但我是华人后代,对自己的祖籍国很感兴趣,想和这边建立更多的联系	19人	33.3%
4、我希望今后有机会能回祖籍国定居	1人	1.8%
5、我不喜欢自己的华裔身份	0	0
未填	1人	1.8%

通婚和信仰状况是了解华裔族群与当地主要族群边界的客观指标,华裔群体对自己特殊身份的主观看法和态度则表达心理的边界。访谈中可以感受到受访者对华族文化、华人身份的认同是

自觉自愿的,有多人认为,华人与土著居民之间的确存在互相歧视的情况,但强调华人对土著的歧视是轻视、土著对华人的歧视是妒忌,是有区别的。这也印证了《星洲日报》关于“华人文化认同程度”的一项调查,该调查显示,马来西亚 88.3% 回应问卷的读者表示愿继续成为华人,与新加坡形成鲜明的对比。[10]从表 6 可知,绝大多数的华裔首先认识到自己是马来西亚公民,同时也清楚自己的华裔身份,可以说他们一方面对华裔和当地人的差异非常敏感,对自己的华裔身份非常在意,同时也很强调自己的马来西亚公民身份,可以说他们对国民身份和华裔身份都有强烈的诉求。正如陈志明指出的“今天他们表现出更大的族群情感。那是因为他们完全认同于马来西亚,因此期望与主体民族拥有同样的待遇。”[5](P30)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马来西亚华裔最能意识到自己的华裔身份呢?在特别能意识到自己华裔身份的复选题中(见表 7),“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华裔”的中选率最高(54.4%),“对华人身份没什么特别认识”的人是极少数,有 42.1% 的被访者认为,在政府将他们与土著居民区别对待时,特别能意识到自己的华裔身份。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的族群意识比较强烈,并有着与生俱来的传承性,具有华人特色的仪式、节庆等象征性符号行为是华裔族群意识再生产的重要渠道和手段。而政府的政策导向也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华人的族群意识,马来西亚宪法规定“马来人优先”,华人二等公民的族群身份显而易见,而生活中也处处遇到族群身份问题,如大学入学、申请贷款、职业升迁等等,族群权益与族群身份挂钩,使华人知道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族群身份,华人只有依靠族群政治来争取自身的权益。所以说,并不是族群认同的出现才导致族群的极化和冲突,而是因为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以及不公平的社会经济分配才迫使人们按族群进行竞争。虽然如此,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却一直相当不错,群体层次上存在的结构性冲突在个人层次上得以认真地回避。[11](P23-32)在我们的访谈中,华人对于马来人的友好、诚实等品德多有称赞,许多人有过与马来人邻居、同事和睦相处的经历。

表 7 你在居住国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下能意识到自己的华裔身份?(复选题)

几种情况	选择人数	中选率(%)
1、没什么特殊情况,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是华裔	31 人	54.4%
2、在家里或华人社区过华族传统节日的时候	28 人	49.1%
3、在家人或华人社区举行祭祀祖先仪式时	23 人	40.4%
4、家里长辈总是不断提醒我这一点	5 人	8.8%
5、居住国政府在政策上把华人和土著居民区别对待时	24 人	42.1%
6、在与居住国土著居民发生矛盾冲突时	15 人	26.3%
7、在居住国时,我对自己的华人身份没什么特别的认识	2 人	3.5%

五、祖籍记忆与祖籍国

这里特别需要廓清“祖籍记忆”和“祖籍国”(中国)的关系。首先,前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后者是一种政治实体,两者之间只是历史的追溯关系,而不是现实的追溯关系,尤其不能把祖籍记忆误解为对中国的国民认同。换句话说,“祖籍记忆”唤起的是“共同祖先”、“共同文化”所产生的文化心理认同,而不是共同国籍或共同身份的政治诉求。我们之所以用“祖籍记忆”,而不用“中国意识”或

“祖籍认同”，正在于避免一些不恰当的暗示。但这并不是说祖籍记忆和祖籍国没有现实的关系。我们通常所说的诸如“中国强大，海外华人也能挺起腰杆做人”等话语，以及无数东南亚华人家庭敦促自己的孩子负笈北行等等现实，都在暗示一种真实关系的存在。这种关系究竟有些什么内容，我们需要立足于自己的问卷(表8和表9)及访谈来说明。

建立和祖籍国的联系是华裔强化自己的祖籍记忆的重要渠道，由于我们的调查对象绝大多数是在中国读书学习的华裔学生，因此我们通过询问他们来中国学习的动机来追溯他们意图和祖籍国建立什么样的联系，有什么结果。

表8 为何来中国读书?(复选题)

来中国读书的原因	被选次数	中选率(%)
1、学习有用的知识并掌握或提高华文水平，以便将来在居住国择业中有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	9	50.0
2、我希望增加对中国的了解，以便将来在中国乃至华人经济圈中获得更广的发展空间。	5	27.8
3、父母家人希望我到中国读书。	3	16.7
4、到中国读书比较便宜，经济上能承受得起。	2	11.1
5、居住国社会环境动荡。	0	0.0
6、我是华人，我希望对自己的祖籍国有更多的了解。	8	44.4
7、作为一名华人，我想我应该对自己的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更深认识。	7	38.9
8、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吸引了我。	11	61.1
9、旅游以增长见识，开阔视野。	10	55.6

表9 你在中国有什么收获?(复选题)

	中选率(%)
1、学习汉文的语言环境，使您的汉语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44.4
2、使您增加了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了解。	83.3
3、使您进一步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33.3
4、使您对华人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55.6
5、使您对父祖辈的感情有了更深的理解。	11.1
6、使您开始喜欢中华文化。	5.6
7、使您开始懂得华人与别的民族有什么不同。	22.2

注：表8和表9只保留了真正在中国学习的马来西亚人的案例，共计18份问卷。

表8的9个选项中，前5项都属于现实主义动机，不过第1、2项是和未来经济机会相关的主动性指向动机，第3、4、5项是面对当前现实的被动性指向动机；其他是超越现实主义考量的动机，我

们定义它为和祖籍记忆相关的动机。表9的后5项都意味着与祖籍国建立联系在重建他们的祖籍记忆上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据此,我们能够了解到以下几点:

第一,祖籍国和个人经济机会的现实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足进步,实际上为海外华人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机会和未来发展期待,这在华裔新生代来华学习的动机中得到体现。而在实际来华学习的过程中,虽然主动关注的程度不一,但是他们获得的决不仅仅是华语能力的提高,同时也多少关注到中国的现实、文化习俗并感受其魅力。所以,即便是出于功利主义的动机而来,所获也不会仅仅是功利性的满足。

第二,祖籍国和祖籍记忆的象征性关系。在来华学习的主观动机和实际结果中,马来西亚华裔对与祖籍记忆相关的内容表现出相当的关注,他们来华不仅对祖籍国的历史文化习俗投以相当有心的关注,而且表现出相当高的心理需求层次。

第三,把祖籍国的“对象化”策略。在表8、表9中,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对中国的现实表现出非常大的兴趣。对于这种浓厚兴趣的原因,由于我们缺乏进一步追踪的提问和资料,一度感觉很难解释。不过在我们委托在马来西亚当地进行的问卷中,有一份李姓受访者不仅回答了问卷的各个问题,还对自己的选择做了很多批注,如:

希望观察中国如何在走出“共产主义核心”转型到“融入社会主流”时,如何在政策及各领域强化自己。学习中国的“现代化”,思考马来西亚可以学习的地方。

共产国家机制的运作,人民参与建国的过程中是一个怎样的感受。

我会定居马来西亚,这是我毕生服务的大地,我会将自己的所学贡献给我的祖国——马来西亚。

我们自认是马来西亚的国民,我们会争取自己在这土地的公平待遇,而非被其他人视为二等公民,我们在马来西亚发扬自己的文化、教育、经济及政治……参与这个国家的建设。

这份问卷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近于深度访谈的资料,这些批注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一条线索。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来华学习过程中关注历史文化和习俗,因为这些可以涵养和丰富自己的祖籍记忆,进而可以强化自己华裔族群的认同,是对自己和马来西亚土著的“不同”的一种确认;而关心中国的现实,一方面也有上述的作用,同时,从李姓问卷批注中表现出的关注点,和措词中表现出的从“外部来观察”的角度,使我们意识到另一方面的作用,甚至说可以建立另一种理解:关注中国现实,是要确认中国和马来西亚的不同,从而确认马来西亚的华人和在祖籍国的华人的不同,或者说凸显华族和中国人的不同。我们把这种现象理解为当地华人族群立足本地生存和发展而把祖籍国“对象化”或“客体化”的策略。

结 论

我们的调查表明,在已经以多元文化主义为诉求的马来西亚表现出这样的特征:华裔新生代的国民认同和族群认同均表现出相当的强度,我们倾向于把这种“双强”的特征看作是东南亚走向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华裔集体自我意识的结构特征。一方面,为强化族群意识,他们可能通过和祖籍国建立更多的联系来维持和加强祖籍记忆;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主义因为强调差异性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倾向于把由历史、文化等因素形成的差异——缕列并建构边界,从其实践的层面上看,它具有反对诸如“大中华认同”这类现代性“宏大叙事”的特征,在这种实践脉络下,华裔族群将祖籍国对象化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现象。

由于时间、经费、方法上等各种原因,我们调查所涉及的马来西亚华裔的人数有限,大多是家庭经济状况中等、个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部分,深入的程度也很粗浅,局限性相当明显,他们并不能全

面反映马来西亚各阶层华裔青年的状况。但是,根据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阶级构成、阶层分布等情况看,^①这部分人是华裔青少年中最重要的部分,有一定的代表性,这群人总体数量不少,家庭环境和本身条件都比较好,起点高,在今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我们应该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思想观念,加强对他们的服务工作,通过他们来影响其他华裔青年。这将有利于华族文化继续成为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利于华人在当地的生存发展。

参考文献:

- [1] 廖小健.世纪之交:马来西亚[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 [2] 韩方明.华人与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3]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整合式革命:新兴国家里的原生情感与公民政治[M].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91 - 354.
- [4] 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M].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2.
- [5] 陈志明.华裔族群:语言、国籍与认同[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4).
- [6] 庄国土.略论东南亚华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发展趋势[J].厦门大学学报,2002,(3).
- [7] 周聿峨,龙向阳.马来西亚华族的民族母语教育[J].世界民族,2002(3).
- [8]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3.
- [9] 陈志明等.传统与变迁:华南的认同和文化[J].北京:天津出版社,2000.
- [10] 福建侨报,2000-03-03.
- [11] 陈志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6).

[责任编辑:廖大珂]

Probe into the "Memory of Ancestral Home" among the New Generations of Citizens of Chinese Origin in Malaysia

YU Yun - ping, YANG Jin - tao

Abstract: Ou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new generations of citizens of Chinese origin in Malaysia have expressed the strong identification both in ethnicity and citizenship. We see this "dual intensity" as the structural trait of their collective self - consciousness towards multi - culturalism. The memory of ancestral home is the very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basis of their ethnic identific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y may maintain and strengthen their memory of ancestral home through making more contacts with their ancestral country; and on the other, i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multiculturalism, they can strategically take their ancestral country as an object for local sub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Malaysia; new generations of citizens of Chinese origin; memory of ancestral home.

^① 战后,华人在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呈上升趋势,职业变化向高收入方向发展,至1995年,华人的平均收入仍领先其他各族。(参见廖小健《世纪之交:马来西亚》,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1990年,华人中产阶级已占华人人口的43.2%。(参见陈晓律等《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中的民主与权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页。)

